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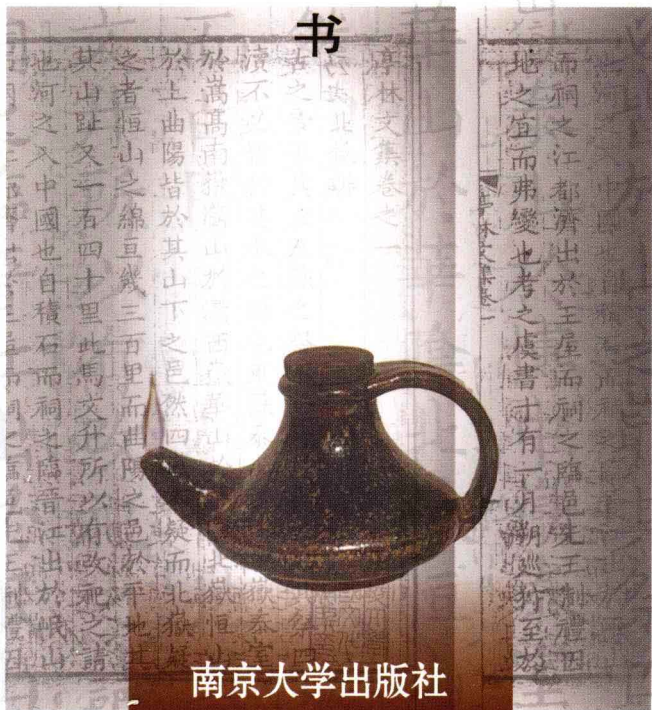
匡亚明

主编

许苏民
著

顾炎武评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GU YANWU

(Book 2)

Xu Su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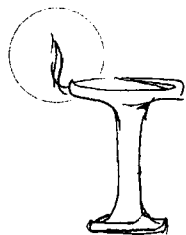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305-06063-2



9 787305 060632 >

定价：104.00元（上、下）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顾炎武评传 (下)

许苏民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炎武评传/许苏民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6063 - 2

I. 顾… II. 许… III. 顾炎武(1613 ~ 1682) - 评传
IV. B24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3366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顾炎武评传

许苏民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 rulin. com. 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52.75 字数 568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063 - 2

定价:104.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左 健 巩本栋 茅家琦

周 亮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五章 顾炎武的道德 伦理思想

与中国传统的主流伦理学说相区别,顾炎武的伦理学说并不是从“至善”的道德理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存在的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来探讨最合乎人性之实际和社会生活发展之实际的切实可行的道德伦理规范。这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学说与宋明理学相区别的最显著特征,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他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而是肯定人们的“私”和“欲”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道学说教,而是讲“不能使天下无再适人之妇”和先王的“恤孤之仁”。第二,他从现实的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对儒家传统的道德观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修正。

他反对“爱有差等”说,尤其反对将这一学说运用于社会公共生活所导致的庸俗关系学;反对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认为“穷而在下位者”亦有救世之责;他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反对不切实际的道学说教,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并由此而探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之路。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

顾炎武的“行己有耻”的道德伦理思想,从思想学术渊源来说,既是对陆王心学的“良知”说的改造和发展,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王阳明的“狂者胸次”说、李贽的“人必有私”说以及晚明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同时,由于他特别注重社会实际的考察,因而对社会生活中的弊病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在理论上对道德与经济发展、道德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多创特解。这对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第一节 顾炎武伦理思想中的问题意识

——对中国传统社会负面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对传统的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所造成的负面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翻开顾炎武的《日知录》,可以发现很多批判中国



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的言论。对于这些负面的国民性,顾炎武也像考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学和史学的源流等等一样,原原本本地追溯其由来及其历史的演变,揭示其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对传统中国负面国民性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批判,构成了顾炎武伦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像他这样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国民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他认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负面国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夸毗”之性

何谓“夸毗”?顾炎武引《释训》和《后汉书》告诉我们:所谓“夸毗”,就是没骨气、没操守的意思(《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夸毗”之性,就是奴才之性,谄媚之性,苟且自保之性,畏忌因循之性,善于变化、毫无特操之性。但顾炎武说,“夸毗”之性并不始于汉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盛行:“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①

“夸毗”具有以下具体特征。其价值观念是:“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夸毗》,《日知录集释》第98—9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其行为方式是：“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①白居易的《胡旋女》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这两句诗就是形容那些如同歌妓舞女一般的士大夫的。用鲁迅的两句带有大男子主义色彩的话来说，就叫做“男人扮女人”，叫做“以妾妇之道治天下”。

“夸毗”之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首先是造成了政治的昏乱：“朝寡敢言之士，廷鲜执咎之臣”，“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其次是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更有甚者，顾炎武认为，正是这种奴隶根性，是造成民族沦亡的祸根之一：“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遭天祸。”“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②

近代梁启超作《新民说》、邹容作《革命军》，其中都有许多与顾炎武的以上观点相似的论说；鲁迅对“做戏的虚无党”的严正批判，也与顾炎武的以上论说如出一辙。

①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夸毗》，《日知录集释》第98—9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二、贪婪之性

顾炎武认为,专制政治体制造成了社会的普遍性的腐败。腐败现象贯穿于全部专制政治史,尤以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最为盛行。在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专制政治的体制性腐败无孔不入的性质,更使腐败从官场向整个社会迅速蔓延。从达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游闲无食之人”,其心术之败坏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日知录》卷十二《河渠》条说:

闻之先达言:天启之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筭之人焉足责哉。^①

黄河决堤本是天大的灾祸,可是上至河道总督,下至普通河工,却年年希望黄河决堤。管理河道的官员们年年指望着从国家的治河经费中侵克金钱,“游闲无食之人”年年指望着从河工上支领工食,导致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年年治河,却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河渠》,《日知录集释》第460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几乎年年有决口。心术之败坏到了如此之地步,简直是无可救药!而政治腐败则以皇城北京为最甚:

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吏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①

顾炎武的卓识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这种普遍性的腐败,更看到了这种普遍性腐败的根源乃是“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筭之人焉足责哉”。这种深刻的洞见,比起只是谴责那些“斗筭之人”的清官型的政治家来,毕竟是要高明一万倍的。

三、势利之性

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爱有差等”,爱的差等是直接与等级名分的尊卑贵贱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亲者、尊者要亲厚,对于疏者、卑者要疏薄。这一原则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就造成了人们日益滋长的势利之性。顾炎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对人们的势利之性、特别是普遍盛行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势利之性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河渠》,《日知录集释》第460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顾炎武认为,势利之性具有以下表现:

一是在家庭中强分尊卑贵贱,在本不应区分尊卑贵贱的地方也要分出贵贱来。如兄弟之间,以嫡出为尊贵,以庶出为卑贱。汉儒何休认为这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的表现,对此,顾炎武严正批评道:“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①

二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庸俗关系学盛行,只认关系,不讲道义。儒家道德伦理的一大弊病,就在于待人接物总是以关系之亲疏、人情之厚薄为转移。此种情形在汉代就已十分流行,《日知录》卷五《邦朋》条引汉代荀悦之言说:

荀悦论曰:“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为太息者此也。^②

正因为官场和学界都是只认关系,不讲道义,于是人们为了谋取私利,就不择手段地攀附权贵。唐代以来,以科举取士,庸俗关系学的名目更加繁多,宗法关系全面渗入官场和学界,成为政治上的朋党、学术上的门户。顾炎武《生员论中》说: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母弟称弟》条,《日知录集释》第15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五《邦朋》,《日知录集释》第18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倾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也。^①

三是导致人们为追求富贵而荣辱不分、以耻为荣,乃至无耻到了靠裙带关系取富贵、甚至自宫以进的地步。顾炎武认为,专制制度的森严等级造成了人们的势利之性,这种势利之性早就发展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例如《日知录》卷二十八《纳女》条说:

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后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②

又如《日知录》卷九《禁自宫》条说:

① 顾炎武:《生员论中》,《顾亭林诗文集》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纳女》,《日知录集释》第100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觊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槩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①

皇宫中聚集着数以千计、万计的宫女和太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而这一弊政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兴盛,是因为有以当宫女和太监为荣耀的国民性。在顾炎武看来,给皇帝当小老婆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可是如今的士大夫们却以此为荣,岂非咄咄怪事?他说古人不像今人这样势利,古代的正直士大夫决不想借女人的裙带来扩大自己的权势,更不以自己的女儿给皇帝当小老婆为荣耀。他举汉代的丞相王商、后魏西兖州刺史郑羲为例。王商在朝廷的政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就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以为内援,并找皇帝的新宠李婕妤帮忙,被大中大夫张匡所奏而被免去丞相的职务,死后谥曰“戾侯”。郑羲是个贪官,虽然女儿当了皇妃,他自己也被提拔到朝廷的秘书监任职,但还是被人瞧不起。可见古时候一般的社会舆论是并不以纳女后宫为荣的,哪里像后来的人那么势利!最早考察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谈到了中国人以纳女后宫为荣的势利心态,他问道:“人民会不会因他们的女儿被君主强行纳入后宫而感到委屈?不,决不会的。相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禁自宫》,《日知录集释》第350—35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反的,他们认为这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一种恩典和荣誉。”^①在一般的西方人看来无疑是要感到委屈的事,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却认为是洪福齐天,这是马可波罗不能不感到不可思议的。如果普天下人都以纳女后宫为耻,那么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帝王占有大批妇女的特权也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了。皇帝既不能占有大批妇女,也就无须再用太监,由此可以废止每年阉割一千多名青年男子为太监的虐政,为图富贵而自宫为太监的风气亦可从此消失。

宦官、后妃依仗的是皇帝的权势,而给达官贵人抬轿子的、当家人、当衙役的,则依仗达官贵人的权势为非作歹,民间有“宰相家人七品官”之说,而正直的社会舆论则斥之为“狗仗人势”。可是,在晚明,就连素重“流品”的“搢绅之士”们也出于势利的眼光,来巴结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了。《日知录》卷十三《流品》条说:

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为东林诸公大玷。),诗字颂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②

士大夫结交阉宦,成为晚明政治的一种奇特的现象,相当普遍。乃至在宦官魏忠贤当政时,出现了“公卿上寿,宰执称

①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第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流品》,《日知录集释》第484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儿”的怪事；而讨好巴结达官贵人的轿夫、家人，以此作为结交权贵的捷径，更成为官场上普遍流行的风气。顾炎武认为，国人们的势利之性也足以导致亡国。明朝灭亡，“神州陆沈，中原涂炭”，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国人们的势利之性也是导致亡国的因素之一。

当然，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奴性十足，其中自不乏独立特行之士。顾炎武对奴性和势利心态的批判就表明了这一点。

四、虚伪之性

顾炎武认为，道德的精义在于真诚，虚伪则是与道德的本质相违背的。可是在中国，“上自宰辅，下之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①

道德的表象下面却往往隐藏着完全相反的内涵：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②

这不是十分令人惊诧吗？可不幸却是事实。在顾炎武看来，儒家的一套丧礼已经是够复杂的了，而后世儒家又使这一套丧礼更加复杂化，以至流于虚伪。对此，顾炎武引吴幼清《服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吏胥》条，《日知录集释》第293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三反》，《日知录集释》第500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制考详序》，对此作了深刻的批评。他说：

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实，而不究古人制礼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丧之实也，自尽于己者也；后世所加者，丧之文也，表暴于人者也。诚伪之相去何如哉！^①

他看到了虚伪具有“人情所趋，遂成习俗”^②的普遍性和胶固于人心的牢固性，揭露“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于古，而反讳其行事”^③，以此说明末世的风俗比盛世更为虚伪。他甚至说今天的那些用谎言来欺骗民众的人在才能上远比古人下劣：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其于利害得失之际，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视之可尔！^④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五《三年之丧》，《日知录集释》第19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日知录集释》第54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③ 顾炎武：《程正夫诗序》，《顾亭林诗文集》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 顾炎武：《与人书十五》，《顾亭林诗文集》第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